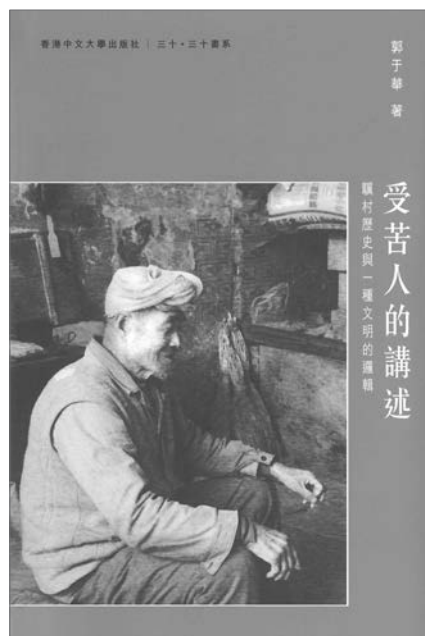


底層之「苦」與文明之「惡」

——評郭于華《受苦人的講述：驢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

● 孫沛東

郭于華早在1990年代就意識到搶救底層歷史、打撈底層記憶、傾聽底層聲音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從那時起，她和她的團隊在陝北農村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田野研究，收集了豐富的一手口述史資料，並最終凝煉成書。



郭于華：《受苦人的講述：驢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近兩年，筆者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為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這門課程，第一講專講毛時代的中國農村，研讀

的專著就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2013年出版的大作《受苦人的講述：驢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以下簡稱郭著，引用只註頁碼）。為甚麼選這本書？

對於理解1949年以來的共和國歷史，官方的宏大敘事和民間的集體記憶是兩條並行的線索。官方敘事一般關注高層政治和社會治理，直接來自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底層生態和草根立場一直處於歷史的邊緣地帶。然而，作為六十多年來中國大陸所發生的歷史鉅變的親歷者，尤其是普通農民，他們能否並如何敘述自己的歷史？當他們回想起土改以來在農村進行的一系列運動，他們都記得甚麼？回答上述問題的主要資源是中國農民的個人和集體記憶，而這類口述史資料正隨着親歷者的日益衰老和逐漸離世而愈來愈難以被學者搶救。

郭于華早在1990年代就意識到搶救底層歷史、打撈底層記憶、傾聽底層聲音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從那時起，她和她的團隊在陝北農

村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田野研究，收集了豐富的一手口述史資料，並最終凝煉成書。郭著為我們理解毛時代的中國農村提供了一個珍貴的陝北農民版本的底層歷史。

本文將圍繞陝北驥村農民口述史中最具代表性和地方性的兩個概括性詞彙——「苦」與「惡」，集中討論農民在「心靈集體化」中所經歷的「苦」以及在脫離「苦難」和「繼續革命」中體會到的種種「惡」，並兼談郭著的方法論亮點和研究局限。

一 「心靈集體化」中的「苦」

一般而言，建立在扎實田野研究的社會科學專著的主標題（至少其靈感）都直接來自田野，「受苦人的講述」這個題目大致如此。作者認為「受苦人」的概念是我們理解歷史上和現實中農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進行自我分類的一把鑰匙。生活在傳統農業社會或帝制時代的陝北驥村農民自稱為「受苦人」，包含着職業分工、勞作類型和是否佔有財產等多種內涵。這裏的「苦」，指向他們日常生活中的「身體之苦」和「心靈之苦」。郭著的標題直接賦予通常在歷史上失聲的農民主體性地位，符合作者「傾聽底層」的初衷，以及「從底層的苦難講述中構建歷史」^①的主要動力來源。最為關鍵的是：「受苦人」是當地農民對自己的界定，尊重並採用被研究者的自我定義體現了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尊敬。筆者經常以深度訪談作為研究資料的重要來源，因而特別看重這種敬意，因為這些口述史料和故

事是被訪者的人生經歷，有時候甚至是困厄和苦痛的回憶；我們的研究受益於他們的慷慨、寬容、耐心和分享。

如果說斯大林時代的「集體人格」是蘇維埃新人的共同特徵，那麼毛時代完成的「心靈集體化」則是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造就「社會主義新人」的重要主題。英國歷史學家費吉斯(Orlando Figes)對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的研究表明：執政的布爾什維克曾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塑造新人運動，這種新人的最大特徵在於他們擁有只為公眾利益而活的「集體人格」，它是以沙俄時期的革命家為榜樣，民眾深受「成為蘇維埃人」的渴望所鼓舞或裹挾，以此構建全新的道德觀，甚至後來很多社會主義者把培養具有「集體人格」的新人當作革命的根本目標^②。郭著中的「心靈集體化」是一個有解釋力的概念（頁154），是對蘇聯和中共的「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進一步概括，作者以此揭示共產主義文明的邏輯之所以能在相當一段時期內運行背後的人的要素。

從國家治理層面講，靈魂治理是一個關鍵性工程，通過制度化的方式掌控民眾的心靈，中共力圖實現對社會的管制。台灣學者余敏玲對中共塑造「新人」理念的起源與發展、宣傳新人的成效、新人與黨的角色以及中、蘇新人的差異的研究表明：蘇聯經驗是毛時代中共執政的重要參照體系，隨着中蘇關係由蜜月期到逐漸惡化，毛澤東不斷強化了階級鬥爭的觀點，這是對斯大林模式的重大修正。就塑造新人而言，中共在毛時代具有相當成效。

陝北驥村農民自稱為「受苦人」。這裏的「苦」，指向他們日常生活中的「身體之苦」和「心靈之苦」。郭著的標題直接賦予通常在歷史上失聲的農民主體性地位，符合作者「傾聽底層」的初衷，以及「從底層的苦難講述中構建歷史」的主要動力來源。

郭著一方面關注普通農民在狂飆突進的革命運動中如何生存和應對；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共在農村實施社會動員和治理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原因。作者嘗試建立一個社會科學的解釋框架，以此解釋共產主義文明的邏輯。

雖然中共可以主導並傳播正確的新人觀，但無法完全控制民眾如何解讀新人和好黨員的標準。從民眾對官方主導的新人宣傳的多樣性回應來看，即使在毛主義下的中國，民眾也並不是毫無個人觀點、完全受制於主流意識形態灌輸而被原子化的個體。當然，異見份子及其「反動」行為會受到黨國的嚴厲打壓^③。

「心靈集體化」的前提是政治分類。中共政權進入農村以後，如何迅速建立合法性？一個便捷有效的方法就是進行階級分類，透過發動群眾「訴苦」，發掘並強化農村的各種衝突，為在農村劃定階級成份創造合法性依據——受苦，一起來「訴苦」，挖苦根，啟發農民認識到失去土地，以及地主、富農、反動派、壞份子等等的壓迫和盤剝是農民受苦受難的根源，由此得出農民之苦實為階級剝削之苦的結論。那麼，如何脫離苦難？跟着共產黨鬧革命！繼續革命，不斷革命。郭于華團隊對於土改和集體化中「訴苦」的研究表明：「訴苦」是一種權力技術，是重構社會認同，劃分階級，進而實現對農村社會重新分化與整合的努力（頁102）。正如郭著中所言，面對廣袤而凋蔽的鄉土社會和分散而落後的農民大眾，要將其組織成摧毀舊世界、建設新社會的力量，塑造成新國家的人民，分類就成為一個必不可少的手段，這也是實現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而「訴苦」機制主要是通過階級分類實現的。這實際上牽涉到規則的重新制訂。

從規則的角度來看，政權的更迭也可以視為規則制訂者和規則的更換。新當權者會通過分派角色（如劃定政治成份），改變並重新修

訂規則來繼續遊戲，同時實現對民眾和社會的管控。比如在視為創建新社會的關鍵的學校教育中，蘇維埃課程的指導方針是傳播共產主義價值觀；進步學校辦成微型的蘇維埃國家；孩子受到鼓勵，自覺扮演革命家；最流行的兩個遊戲是紅軍與白軍的戰鬥和搜索與徵用。這類遊戲鼓勵孩子接受蘇維埃世界的兩分法：一面是「好」，一面是「壞」^④。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俄國著名作家高爾基（Maksim Gorky）提出「政治生活的新結構向我們要求全新的靈魂結構」^⑤。在曾經的蘇聯、東歐、中國和今日之北朝鮮，全能主義國家的影響滲透在社會結構和民眾的心理結構中。

郭著立意高遠，力圖以「政治分類—『訴苦』機制—分化整合—塑造認同—社會控制—新政權合法性生產和維續」為敘事線索，通過「受苦人的講述」，一方面關注普通農民在狂飆突進的革命運動中如何生存和應對，以及他們對這一過程的感受和評價；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共在農村實施社會動員和治理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背後的原因。郭于華認為1949年以後中國農村出現的多次運動式治理實際上都與文明背道而馳，她嘗試建立一個社會科學的解釋框架，以此解釋1949年以後進行的一系列「脫離苦難的社會工程」、「社會實驗」、「社會園藝」和「繼續革命」（頁115、139、167）背後共產主義文明的邏輯，尤其是在這一過程中，一系列苦難、暴力、野蠻和殘酷的行為，為何在一夜之間遍布中國農村社會。文革解釋學的困境之一就是：紅衛兵為何一夜之間湧向街頭，舉起帶銅扣

的皮帶抽向自己的老師？除了年青人荷爾蒙旺盛之類的生物學解釋，以及紅衛兵在建國十七年以來的養成教育（尤其是階級鬥爭教育、接班人教育），學界至今鮮見更有說服力的解釋。郭著提出的共產主義文明的邏輯或許能為解開這一謎團提供一條新的思路。

二 脫離「苦難」和「繼續革命」中的「惡」

郭著提出了共產主義文明的五個邏輯：(1) 將日常生活中的苦難轉變成階級之苦——資本價值論向勞動價值論的轉換；(2) 「繼續革命」、不斷「運動」的動力機制；(3) 「楚王好細腰」——運動沒有不「過頭」的；(4)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甚至不惜調動「惡」的力量；(5) 「成王敗寇」、膜拜強權、崇尚暴力的邏輯（頁225-43）。總體看來，郭著試圖提出一種機制性解釋：通過對共產主義文明的五大邏輯的分析，認為共產主義文明為人類文明增加了第三重維度。按一般的理解，以往的文明不僅包括縱向性的、外擴式的發展，如工業化、現代化等，而且包含橫向發展，如互動的、溝通的、交流的文明；而共產主義文明增加了第三重維度：內部清洗、甄別和替代機制，群體內部成員的身份具有流動性和不確定性。《共產黨宣言》曾向全世界宣告：「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⑥。那麼，誰獲得了鎖鏈？郭于華提出共

產主義文明的邏輯，似乎把郭著的理論貢獻部分地劃入文化的範疇；事實上，郭著也從組織的視角揭示了這種文明的邏輯所面臨的挑戰。作者在書中多次提到中共如何實現對農村的意識形態滲透及其效用，而意識形態的抓手正是組織。以下筆者試圖借用郭著中部分流氓無產者成為農村土改之初的積極份子這一案例，來具體闡釋中共在農村遇到的組織成員的問題。

1946年以前在驢村這個傳統村落中，與「恩德財主」相反，有一些「黑皮」、「野鬼」、「混種子」，即生性頑劣、品行不正、為人霸道、行為暴戾之徒，他們是土改的積極參與者。其中最為典型的「黑皮」就是以暴力手段娶地主女兒為妻的二發子，此人是地道的窮漢，「沒有正經生活，靠撿煤炭為生」，「那驢日的是賴東西，是個兒貨^⑦，脾氣可壞的過惡了，就那麼個黑皮雜種」（頁60），但就是這個人，在土改運動中把握時機並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當上了土改積極份子和基幹連連長，並成為殘酷鬥爭、拷打地主的主角。結果一個被打怕了的地主，只得把自己十幾歲的女兒許配給了一直娶不到「婆姨」（陝北方言，即妻子）的二發子。

二發子之流為何能在土改中受益？根據近年來新發掘的土改史料和相關研究，學者對新解放區（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台灣省外）農民土改心態的研究認為：首先，富農和中農處於被剝奪地位，傾向自保或保持中立，他們對土改的發展不構成阻力；中農對土改動機不強，一般持旁觀態度；而貧僱農對土改的實際態度與預想中的差

按一般的理解，以往的文明不僅包括縱向性的、外擴式的發展，如工業化、現代化等，而且包含橫向發展，如互動的、溝通的、交流的文明，而共產主義文明增加了第三重維度：內部清洗、甄別和替代機制，群體內部成員的身份具有流動性和不確定性。

在郭于華看來，靠發掘和調動人的私欲和內心深處的惡來實現社會動員的做法，不可能達到至善的結果，也不能帶來社會公正。像二發子這類人混入農會組織，成為土改積極份子，短期內可能有效推動運動，但是不可避免地滋生負面後果。

距頗大。因為農村社會內部不同階層間佔有土地的差別，即貧富對立並不像理論上那麼懸殊，再加上「熟人社會」中的宗族血緣紐帶，使得一些貧僱農對地主並不嫉恨（少數惡霸除外）。其次，宿命論思想和傳統社會的經濟社會倫理促使貧僱農認為地主家的財產是其勤勞致富、代際積累所得，而「打土豪分田地」是「傷天害理」的行為^⑩。正因如此，除了貧僱農之外，那些長期生活在農村底層的破落農民，如二發子，也可能成為土改的受益者。因為窮得穿不起鞋子，所以革命性也就更為堅決和徹底。

在郭著的田野訪談中，我們發現經過土改和其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和觀念意識重構，村民並沒有改變對二發子的人格評價，提起他來通常還是「黑皮」、「雜種」、「二貨」，這使我們從一個側面發現：1946年以來中共在農村的意識形態滲透，對於農村社區中善惡人品的評判標準的改變效用似乎打了折扣。我們有理由懷疑轟轟烈烈的、意識形態濃烈的「心靈集體化」，果真使得驢村村民被成功改造了或曾經被成功改造？正如劉瑜所評論的：「郭于華敏銳地指出，革命中的思想改造極大程度上依靠紅色恐怖、信息封閉和資源壟斷基礎上的利誘，而一旦這些條件消失或者弱化，那看上去奇跡般的『思想改造』便魔力頓失。」^⑪

在郭于華看來，靠發掘和調動人的私欲和內心深處的惡來實現社會動員的做法，不可能達到至善的結果，也不能帶來社會公正。像二發子這類人混入農會組織，成為土改運動中的積極份子，短期內可能有效推動運動，但是不可避免地滋生

負面後果。當時驢村的土改總結報告也發現了這一問題：「群眾組織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組織不純。這在初期是相當普遍的現象。……組織中混進了二流子、狗腿、暗娼甚至流氓、土匪等成份，開始這些人表現得很積極……」（頁239）

上述案例或可與加拿大華裔作家謝寶瑜長篇小說《玫瑰壩》中的敘事互為佐證。生活在毛時代的女主角陳素芬人美心直，出身貧困，逃難時嫁給了一位好心的地主。根據土改政策，其成份之劃定可高可低，但政策的執行者（她的童年玩伴馮東明和身為革命幹部的親哥哥）卻把她劃為地主，其命運隨之改變。是她的愛慕者黃繼福，而不是與之相愛的男主角馮東明，設法將她的身份從地主改為城市貧民。大煉鋼鐵時馮的同事、另一個積極的革命知識份子又把陳的成份改回地主，差點讓她在大饑荒時期餓死。後來陳的身份在馮的前女友、革命幹部范淑君的干預下，又被改為城市貧民。無奈好景不長，文革中群眾組織的女頭頭因愛慕馮，欲將陳除去取而代之，又宣稱她是地富份子。最後，陳連同她的身為地富子女的兒子和腹中胎兒（馮的孩子），一起被土製炸藥包炸死。小說中「好男人」馮東明一方面積極參與領導土改、大煉鋼鐵和其後的所有運動，另一方面在愛人的政治身份這一問題上的游移搖擺與袖手旁觀，讓我們充分看到這個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帶着深深的原罪感，一心參加革命，爭取好表現的「好男人」內心的懦、弱和惡。他多次背叛愛情，糟蹋信任，讓自己和愛人遭受「怨憎會，愛別離」的痛

苦，他們這一對現代的亞當和夏娃，始終走不出現代的伊甸園^⑩。

《玫瑰壩》中的主要「反面人物」王守倫，是一個既懶且饞的土改積極份子、後來日益高升的基層幹部，其最大的毛病是利用權力玩弄女性。然而，讀者卻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可貴之處：在國家政策迫得農民無飯可吃的時候，他敢於反抗，想方設法留點口糧給農民，以減少餓死；他敢要流氓手段扳倒極左的鄉領導，中止深翻土地等瞎指揮和蠻幹，給農民多點自留地；想辦法少賣賤價糧，給了很多農民一條生路^⑪。王並非好人，但在他身上卻體現出了馮東明這種正面人物身上少見的獨立精神，良知尚存，尤其是敢於與專橫和不公進行鬥爭的勇氣。

上述荒誕現象讓我們不得不反思：為甚麼好人在做壞事，壞人卻能做好事？一些學者對納粹集中營的研究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正派的人」如何且為何成為納粹^⑫？「最差勁的人、那些最適應環境的倖存下來；而那些最優秀的人都死了，為甚麼？真正的劊子手是甚麼？」^⑬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對此也做了深入的思考，在新近為彭小蓮和劉輝合著的《荒漠的旅程》一書所寫的序言中，他替晚清以降一百多年來中國人「一鞭一條痕，一擱一掌血」的一個家族或幾代人詰問：「為甚麼在這百年中，優秀者都不免悲慘命運，忠誠者都會遍體鱗傷，信仰者都死有餘辜?!」他尖銳地指出，如果「這些與國民事業的奠基者血肉相連的大是大非沒有得到澄清，與國家權力捆綁在一起的巨奸頑沒有徹底清算，民族

的優秀者不能揚眉吐氣」，其後果是「歷史的陰影永遠會籠罩在國民的心頭，讓集體吞下藏污納垢的苦水，讓罪惡、腐敗和卑鄙隱藏在表層的巍峨之下，終有一天，樓起了也會坍塌，大國也會成為冰山」^⑭。這些學者的思考，從一個側面再次佐證了郭著中提出的共產主義文明的邏輯的運作模式及其影響力，從制度層面，廓清了良善與罪惡、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截然區分。

三 方法論亮點

作為一個口述史與人類學田野工作相結合的研究，郭于華選取了陝北黃土高原的驢村作為觀測點，該村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和郭于華共同主持的「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歷史收集與研究計劃」的田野調查點之一，同時也是作者及其研究團隊進入次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個工作點。郭著扎實細緻的田野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口述史方面：主要被訪者包括全村七十歲以上的男女村民，凡是能夠進行交談的幾乎都進行了訪談；附帶性被訪者包括離開村莊在外工作的原村民、曾經在當地工作過的幹部和當地名門望族馬氏宗族的後代等，他們成為了主要被訪者——驢村普通村民的重要參照群體。在此基礎上，研究團隊收集到訪談記錄文字稿120萬字；其二，文獻資料方面：來源主要包括與所在地區有關的歷史檔案、有關人員的回憶錄、地方史志、鄉土教材、宗族系譜和相關研究論著等（頁41-42）。

口述史與人類學方法相結合下進行的田野研究，是呈現底層視角和敘事，從而超越「經典事件」的有益嘗試。這源於郭于華試圖改變社會學和歷史學、社會學者與歷史學者之間長久以來處於「鬮子之間的對話」這種狀況的方法論追求。

郭著的方法論亮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口述史與人類學方法相結合下進行的田野研究，是呈現底層視角和敘事，從而超越「經典事件」(canonical events)的有益嘗試。之所以這麼做，源於郭于華試圖改變社會學和歷史學、社會學者與歷史學者之間長久以來處於「聾子之間的對話」(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語)這種狀況的方法論追求。如作者引述新文化史家伯克(Peter Burke)所言：

作者把「受苦人」的人生歷程與歷史變遷和社會結構聯繫起來加以闡釋，一方面揭示了1949年以後國家的宏大敘事和重大實踐的結構性力量和影響；另一方面又通過「受苦人」自身的敘述，展現了社會主義革命洪流中底層民眾的人生軌迹與命運。

社會學家被訓練成注重概括一般規則，因而時常刪除例外的東西；歷史學家則學習如何以犧牲一般模式為代價去關心具體細節。雙方也因此互相挑剔對方的缺點：歷史學家將社會學家看成是用粗俗難懂的行話來陳述顯而易見的事實，毫無時空感，將活人生硬地套進他們的分類並冠以「科學」的標籤的人；而在社會學家看來，歷史學家則是業餘的、近視的，缺乏體系和方法的事實收集者，其「數據庫」的粗陋不堪恰與他們的分析低能相稱。(頁20)

在郭于華看來，一方面，口述史具有獨特的理論向度和解釋力度；另一方面，參與式觀察和民族志訪談這兩種人類學田野研究獲取資料的基本方式，使人類學具有獨特的歷史向度。筆者十分欽佩作者內心懷抱着的「改變歷史的存在狀態的雄心」(頁28)，並認為郭著是一部融合着社會學的想像力與人類學的想像力的佳作。作者把「受苦人」的人生歷程與歷史變遷和社會

結構聯繫起來加以闡釋，一方面揭示了1949年以後國家的宏大敘事和重大實踐的結構性力量和影響；另一方面又通過「受苦人」自身的敘述，展現了社會主義革命洪流中底層民眾的人生軌迹與命運。底層的聲音和人生經歷本身構成了一種超越「經典事件」的武器。

其次，郭著融合法國「年鉴學派」(Annales School)長時段的研究視野，對1949至1980年間驢村經歷的社會主義革命和運動的史實梳理，為追根溯源式定位和剖析研究問題，提供了制度和結構背景。就社會的複雜性程度而言，郭于華在書中所要處理的歷史問題富有挑戰性。整風運動時期的延安，除了共產國際的有限介入以外，相對而言是一個封閉社會，而1949年以後的陝北農村社會的複雜性顯然超過了整風時期的延安。從土改、農業合作化、大躍進、人民公社、社教與四清運動、文革到聯產承包責任制，郭著將1949至1980年間農村經歷的重大政策變動全都勾勒得十分清晰，並交代了相關的歷史脈絡，很能彰顯學術功力。反之，如果以斷代史的寫作方式，只講涉及的年代，缺乏必要的歷史鋪陳，讀者就無從把握和判斷這個研究的脈絡和學術價值，這牽涉到研究者自身對這項研究的定位問題：清楚的定位，有利於彰顯以往研究和自身研究的貢獻與不足，有助釐清後續研究的方向。要做到這一點，對研究問題和研究對象進行追根溯源式的歷史學探究必不可少。

此外，一部好的社會學著述大抵是一個富有歷史感的研究，不會

僅僅聚焦於當下的研究對象，而是用歷史之筆勾畫研究對象的前世今生，形構研究的厚重感，從而得出擲地有聲且有解釋力的結論。舉一小例：儘管作者對驢村的研究時段主要集中在土改、農業集體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四清與文革，但是郭著在第一章就引入驢村所在地區影響力最大的地方精英——扶風寨馬氏家族的歷史沿革，從而廓清 1946 年「一場革命性的巨變山雨欲來」之前當地的經濟關係、宗族勢力、文化地位、社會分層和社會關係（頁 70），尤其是土改之前錯綜複雜的鄉村社會關係，讓我們看到中共在鄉村建立革命政權之前，「鬧紅軍」、「國共合作」抗戰時期及以後，地主與農民之間複雜交錯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以及作為鄉村統治精英的士紳地主與共產黨之間微妙的聯繫。

再次，郭著是在新時期「自下而上」看歷史，通過將歷史學與人類學相結合的實證研究，對中國的社會、歷史和文化進行重新解讀的又一力作。早在 1920、30 年代，費孝通、林耀華、陳達等學者在江南、福建和廣東等地開創性地將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起來，研究中國不同問題^⑤。哈佛大學漢學家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認為就理論視角而言，與以往的「從上而下」看歷史所不同，1990 年代初，從中國南方興起的「歷史人類學派」是「由下往上」看歷史。他們立足於地方實況和地方文獻，從方法論看，「華南學派」強調通過田野調查，收集民間史料和文獻，試圖釐清農村生活和農村社群的組織^⑥。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項飆發現，在日本，每當

左翼知識份子用教條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無法解釋社會底層的運動，從而對馬克思主義產生懷疑時，他們都會借助以柳田國男為代表的民俗學、人類學的研究，對底層經驗形成更直接的理解^⑦。與「書齋歷史學家」不同，文革及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不斷促使知青學者全面推進實證研究。當然，西方史學界微觀歷史學和新社會史等的興起也是這種研究範式轉換的一個重要外因。在海外漢學研究中，諸多體現「自下而上」看歷史的研究範式的城市史著作，如知青一代學者王笛、盧漢超等人的作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⑧。在中國大陸，同為知青學者的高王凌的《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⑨和本文所論述的郭著均以其對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民生活的獨到研究，為我們呈上鄉村史研究的華美篇章。

最後，郭著對底層苦難的研究雖然只是一個小切口，但卻思考大的理論問題，並與其進行對話，這種研究旨趣應該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界的基本共識。自說自話的學術研究對學術共同體的建設作用有限，哪怕是很小的個案研究，也要進行理論抽象，這樣才能使跨學科的關注和探討成為可能。

四 研究局限

毋庸置疑，郭著也存在一些論述、體例和編輯方面的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對「苦」這類概念的地方性解釋仍可挖掘。「苦」和「受苦人」

儘管作者對驢村的研究時段主要集中在土改、農業集體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四清與文革，但是郭著在第一章就引入驢村所在地區影響力最大的地方精英——扶風寨馬氏家族的歷史沿革，從而廓清 1946 年土改之前錯綜複雜的鄉村社會關係。

作者採用了大量陝北米脂地區的方言土語，這是一個語言社會學上的亮點，如果在附錄或者尾註部分作更為詳細的註釋和分析，能夠幫助非本地讀者更好地理解原著。對田野研究中大量陝北方言的地方性內涵，值得更進一步挖掘。

這類概念，是一個民間概念，契合西方人研究苦難、受苦的學術脈絡。然而，中國共產黨的「訴苦」、「憶苦思甜」，跟西方人的理解很不同，是一種很獨特的概念，不僅包括職業分類，也涉及到土地產權，還包含土地的生產力與農民改善生活的希望，尤其是農民對土地的情感認同。土地就是苦根，土地對農民的束縛、土地與農民命運的勾連千絲萬縷，地主和農民的關係世世代代，而中共開展土改之後改變了這一切，直到經濟改革以前，農民世代被「箍控」在土地上。1949年以後中共領導的歷次社會運動對農村社會及其社區網絡，包括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改變，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課題，驢村的案例能夠對此做出更大的貢獻。就郭著所使用的史料而言，若是能夠按照年代或大事記等方式，更為詳細地將與本研究相關的地方性史志等資料進行編輯整理，讓對這個研究有興趣的同仁和後學能夠有一個更為清晰的線索和脈絡，在原始資料的積累和分類使用上，將會是本書的另外一個貢獻。

此外，縱覽郭著，作者採用了大量陝北米脂地區的方言土語，這是一個語言社會學上的亮點，如果在附錄或者尾註部分對此做一個更為詳細的註釋和分析的話，將能夠幫助非本地讀者更好地理解原著。《馬橋詞典》是韓少功為一個村寨編撰的詞典，他認為「任何特定的人生總會有特定的語言表現」。儘管語言與事實、語言與生命的關係複雜，但是韓少功力圖揭示詞語背後的人、人的狀況和人的命運，探索「語言中的生命內蘊」^②。閱讀《馬

橋詞典》，我們可以領略到相同漢語在不同的地方，語法、發音甚至含義都可能存在巨大差異。在筆者看來，分析方言至少可以從地域性和時代性兩個維度進行，比如對於「革命」一詞，不同時空和制度下的人會有不同的閃念。語言是學術研究進入地方社會的一個很好的抓手，就郭著而言，對田野研究中大量陝北方言（比如「恹惶」、「爛杆」、「賴」、「惡」）的地方性內涵，值得更進一步挖掘。

其次，訪談的編號應該配有體例說明，前後保持一致。郭著第一次引用訪談資料時，儘管說明（MSLY0099/MSL）是引文後標記的訪談記錄編碼，但是，其一，作者沒有解釋編碼的規則；其二，訪談記錄編碼不一致，如兩頁之間有三個相關編碼，但明顯並不統一（頁44-45），分別是（MSLY0099/MSL）、（1999 1030/LHR）和（Y0005-6LHS）；其他如（Y0003-4MRT）（頁60）、（LHS/Y0063、4）（頁61）、（Y0088WYY'MSR）和（Y0052-53-54 MRT7&W）（頁155），類似標註還有一些。

最後，部分段落和語句有所重複。作為一部長達三十多萬字的專著，郭著無可避免地在一些地方出現了語句和段落重複的現象，如「生活中種種的壓力、困窘和不適體現為貧困之苦、勞作之苦、家庭關係和婚姻關係之苦、性別區分甚至身體殘疾之苦。飢餓是貧苦最突出的表徵，這類痛苦的記憶在驢村人的講述中從能夠記憶的年代起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頁35、44）；對婦女們所講述的苦難也先後重複（頁36、47）。

五 結語

郭著將原汁原味的訪談資料與簡潔精當的理論闡釋很好地結合起來，透過其敘述，歷史畫面的呈現立體而豐滿；此外，大量使用形象生動的章節標題，能勾勒出1949至1980年代陝北農村社會運動的風雲變幻，給人氣象萬千之感；同時，作者文筆流暢，感情豐沛，字裏行間浸透着深沉剛烈與悲天憫人的關懷。可以說，作為一本研究農民對中共自1949至1980年以來歷次社會運動的主觀感受、理解和應對的專著，郭著無疑是一個在理論和方法上都堪稱上佳的文本。筆者借用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和政治學講座教授休厄爾(William H. Sewell Jr.)的話來評價郭著：「兼具歷史學家對社會性時間(social temporality)的敏感觸覺，人類學家對文化的權力和複雜性的認知，以及社會學家對嚴密解釋的依賴。」^②

如果將當下中國大陸的社會學研究分為三個層次的話，第一個層次是將社會事實和現象本身解釋清楚；第二個層次是在社會事實清楚的基礎上，有適當的方法論支撐；第三個層次是除了事實清楚，研究方法適宜之外，有清晰而且富有建設性的理論對話。並不是所有的社會學專著都能達到第三個層次，從前文的論述可見，郭著是難得的佳作：事實清楚，方法得當且有理論追求。

就史學研究而言，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認為^③：

在我看來，真正的歷史寫作應該包括兩個層面，首先我們應該知道到

底發生了甚麼，但僅僅如此不夠，還要知道這些事件背後的意義。把事件意義和事件本身結合起來是困難的。因為事件的意義是模糊、難以捉摸的，但是我們需要去把握。

至於中國當代史研究，情況則有些複雜。有時我們會批判當下有些當代史研究者，似乎僅滿足於對史實本身單純的追求，而放棄與學術世界對話的責任。在筆者看來，這說法或許稍欠公允。以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歷史研究為例，中國當代史學者面臨的現狀是：公檔不開放或者有限開放，私檔遺失散軼，或事主親友及後人不願公開；親歷者或者早已往生，倖存者或者不願開口，有時即便做了口述歷史，但是對公布時間和條件又有所限制等等，這個領域的很多學者很大程度上還處在一個搜救歷史、打撈史實、拯救資料的原始階段：首先得釐清歷史上到底曾經發生了甚麼，這是基礎性工作；沒有這些，其他都是海灘上的沙堡。一個悖謬的現象是，史學界能比較清晰地梳理宋代、明代的歷史，但是當代史卻因為各種原因，不能被說清道明。

現實永遠不盡人意，但這並不意味着做當代史研究的學者就無可作為。誠然，每一代學人都有其貢獻和局限，對於求學生涯受到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干擾的中國大陸學人不應過份苛責；但是，對於文革以後進入大學學習、之後又有機會出國進修的學者，尤其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後輩研究者，除了薪火相傳、扎扎實實推進基礎的史實重建研究之外，或許與世界學術對話、參與學術積累是義不容辭的責

中國當代史學者面臨的現狀是：公檔不開放或者有限開放，私檔遺失散軼；即便做了口述歷史，但是對公布時間和條件又有所限制等，很多學者很大程度上還處在一個搜救歷史、打撈史實、拯救資料的原初階段。

任和義務。閱讀郭著，是警醒，也是鞭策——讓筆者看到參與共建學術共同體的價值，以及進行中外學術對話的道路充滿挑戰。

註釋

① 郭于華：《傾聽底層：我們如何講述苦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36。

②④⑤ 參見費吉斯(Orlando Figes)著，毛俊杰譯：《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16；31-36；16。

③ 余敏玲：《塑造「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354。

⑥ 參見〈共產黨宣言〉，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261、285。

⑦ 筆者是陝西人，陝西方言中“er huo”，一般寫為「二貨」，意思是指脾氣壞，蠻橫不講理的人。類似說法有「二不唧唧」和「二地很」等，所以懷疑郭著中用「兒貨」指稱二發子這類人，實際上應該是「二貨」的誤寫。

⑧ 吳毅、吳帆：〈傳統的翻轉與再翻轉——新區土改中農民土地心態的建構與歷史邏輯〉，《開放時代》，2010年第3期，頁55-58。

⑨ 劉瑜：〈雕刻「苦」的時光——為郭于華《受苦人的講述：驢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所寫的書評〉，《新世紀周刊》，2013年第38期，頁103。

⑩ 許倬雲：〈前言〉，載謝寶瑜：《玫瑰壩》，簡體字電子版（多倫多：綠野出版社，2013），頁VI。

⑪ 謝寶瑜：《玫瑰壩》，頁628-37。

⑫ 邁耶(Milton Mayer)著，王東興、張蓉譯：《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1933-1945年間的德國人》（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⑬ 萊維(Primo Levi)著，楊晨光譯：《被淹沒和被拯救的》（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頁82。

⑭ 陳思和：〈序言〉，載彭小蓮、劉輝：《荒漠的旅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頁4-5。

⑮ 蔡志祥、程美寶：〈海外學者的「華南研究」〉，《光明日報》，2002年12月22日。

⑯ 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應磊：〈宋怡明：從下往上看歷史〉，《聯合早報》，2014年3月9日。

⑰ 項飆：〈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文化縱橫》，2015年12月號，頁75-76。

⑱ 參見王笛著，李德英、謝繼華、鄧麗譯：《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王笛著譯：《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盧漢超著，段煉、吳敏、子羽譯：《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Hanchao Lu, *Street Cri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ese Beggar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⑲ 高王凌：《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⑳ 韓少功：〈編撰者序〉，載《馬橋詞典》（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頁1。

㉑ 休厄爾(William H. Sewell Jr.)著，朱聯璧、費滄譯：《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1。

㉒ 參見石劍鋒：〈沈福宗的故事是我寫作的典範〉，《東方早報》，2014年3月2日，A25版。